

未名译库·生态批评名著译丛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 环境批评的未来

## 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美] 劳伦斯·布伊尔 (Lawrence Buell) 著 刘蓓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译库·生态批评名著译丛

#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 环境批评的未来

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9-449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批评的未来: 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 (美) 布伊尔 (Buell, L.) 著; 刘蓓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5

(未名译库·生态批评名著译丛)

ISBN 978-7-301-16649-9

I. 环… II. ①布… ②刘… III. 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2099号

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ISBN: 978-1-4051-2476-8

Copyright © 2005 by Lawrence Buell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书 名: 环境批评的未来: 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著作责任者: [美] 劳伦斯·布伊尔 著 刘蓓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649-9/G·284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170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译者序

劳伦斯·布伊尔 (Lawrence Buell) 出生于 1939 年。他在康奈尔大学英语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1990 年起在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学, 并曾任该校英语系主任, 现为该校 Powell M. Cabot Professor。2007 年, 美国现代语言学会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授予他“杰·胡贝尔奖”(Jay Hubell Award)、“美国文学研究终身成就”奖项。

作为生态批评领域一位重要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 布伊尔教授在美国乃至国际生态批评界都享有很高的威望。这本发表于 2005 年的《环境批评的未来: 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连同《环境的想象: 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文化的形成》(1995) 和《为一个濒危的世界写作: 美国等地的文学、文化与环境》(2001) 组成一套“生态批评三部曲”, 为推进生态批评的研究深度、提高生态批评的学界关注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布伊尔的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中, 可透视出其几十年间积累的学术底蕴。他的学术研究重点是文学与环境话语、文化民族主义和美国文学比较研究等, 在从事生态批评研究之前, 他在超验主义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即为学界关注。他是《文学超验主义》(*Literary Transcendentalism*, 1973)、《新英格兰文学文化》(*New England Literary Culture*, 1986) 等专著的作者。他于 2003 年发表的专著《爱默生》(*Emerson*) 独特地评估了爱默生对思想领域极富原创性的贡献, 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获得了(为奖励优秀文学批评著作所设的)沃伦-布鲁克斯奖 (Waren-Brooks Award)。

布伊尔的生态批评研究呈现出学术态度公允、问题意识强烈、理

论基础厚重、文本视野广阔的特点。与一些强调将环境主义实践形式融入学术研究、尽力扩大“运动”规模的学者相比，他的研究出发点是同样的——他一贯强调自己和广大同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一个生态意义上的“濒危世界”，坚信“努力思考地球濒危的状况与生命的未卜命运之涵义”、“转变环境价值观、环境感知和环境意愿”（见本书序言）是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的责任所在；而更为可贵的是，他冷静地直面生态批评当前存在的不足，努力提高“文学与环境研究”的学术化程度——通过加强学术深度而获得学界对其“合法性”的公认；探索其作为一种新型文学研究而非“运动”的操作规范；探讨在文本与世界关系等文学理论视野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将文化地理学尤其是地方（place）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伦理、环境正义等（广义的）“生态理论”运用于文学文本分析的具体模式；挖掘超越自然环境题材和非虚构体裁的局限、普遍适用于生态批评研究的“环境文本”之内涵。从布伊尔多年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在寻找兼具研究者、教育者和公民三种身份的生态批评家将职业化研究、环境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有效结合的道路。在他看来，“未来的环境批评”要取得真正的成熟与成功，主要不能凭借参与者规模的扩大，而是要获得学界公认的“合法”地位、“界定批评研究的特有模式”、“在学院以外确立其重要地位”这三个方面的长足进步，在学术性和思想性方面达到一定高度，才能赢得“文学和其他领域的人文主义者对环境性的持久关注”（参见本书第五章），继而实现绿色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用“环境批评”代替“生态批评”作为未来该项研究名称的良苦用心。使用“环境”而不是“生态”作为词缀，不仅是为了确定这种研究的学术范畴，或者体现其跨学科性，更是理性而全面地审视现实“环境状况”的结果，因为“一切‘环境’实际上都融合了‘自然的’与‘建构的’元素”。城市等人为环境的问题和环境平等之类的社会问题，都已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生态问题（参见本书序言和第四章等）。有鉴于此，布伊尔在本书和其他著述中多

次用“环境性”概念来强调人类从身体到精神与环境不可须臾分离的特性，主张环境批评应当着眼于此来探讨词语世界与实在世界/环境的关系，并探讨感知这种关系的方式（如本书第二章的研究）。在译者看来，这体现了一种富有学术建设意义的绿色情怀，提倡“环境批评”不仅没有违背“生态”精神，而且更加符合“生态”精神。

布伊尔教授是译者踏入生态批评大门后见到的第一位美国学者，其著述为译者过去 10 年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导航和启示。能够把他的文字介绍给我国读者，译者倍感荣幸，也深知不易。许多同行知道，其著作旁征博引、喜用（跨学科）术语行话，句式多曲折，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虽然本书已比其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相对简洁，“布氏语言”的特点仍时露峥嵘。怀着对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责任感，译者竭力在忠实传递原作语意和风格的同时，保持中文的明晰，不敢以译文晦涩陷读者于茫然。自知疏漏难免，但求心安。

在此特别感谢布伊尔教授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的解疑。感谢本书责任编辑于海冰博士的一向支持。感谢我的同行兼朋友斯洛维克教授和韦清琦博士，四年前南京紫金山上的漫步仍历历在目，若无他们和此后王宁教授等的努力，关于出版美国生态批评丛书的讨论，不会于今日变成现实。

刘蓓

2009 年 8 月

谨识于济南历山之麓

## 序 言

本书的写作对象，是一切有时间和意愿为文学和文化研究努力思考地球濒危状况与生命未卜命运之涵义的人士——也包括持相反观点的人士。杜波娃(W. E. B. Du Bois)曾经预见：20世纪大的公共问题将会是种族分界线的难题。值此新世纪之始，该问题并无减弱的迹象。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更为终极和紧迫——对绝大多数地球居民来说，如不对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进行重大改变，地球生命还能否存活？像种族主义一样，环境危机是一个涉及广泛的文化问题，而不是哪一个学科的专有财产。一切有思考的人都会关注此事。对于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领域来说，这是最为显而易见的。高校内环境研究项目一般正是以这些领域为基础。但是与其相比，环境倾向的人文学科研究之重要性没有丝毫降低。这些学科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文化地理学、文学及其他艺术。要使技术突破、立法改革以及关于环境福利的书面盟约等付诸实施，即使只是初步形成，都需要一种环境价值观、环境感知和环境意愿已获转变的氛围。为此目标，故事、意象、艺术表演以及美学、伦理学和文化理论的各种资源都是举足轻重的。

《环境批评的未来》集中研究的，正是相关的文学创作、批评和理论就这些问题有何表达。本书与《环境的想象》(1995)和《为一个濒危的世界写作》(2001)共同组成三部曲，并试图在保持原有突出优点的同时，对第二部书的框架有所扩展和深化。本书有两个用意：一是表达我加深思考后的判断，二是更为简洁清晰地作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绿色文学研究绘制出路线图，说明其内部的趋势、重点和争论。

说到“判断”，并不意味着我要不顾原作之意而将既定的原则立场强加给创作性或批评性著作。任何严肃的读者都知道，艺术或者批评的不同类型中，采取随意暗示性思想实验形式者，可以比约翰·济慈所蔑称的“对我们进行可察觉的图谋”的公开辩论者更具启发性。<sup>[1]</sup>西奥多·阿多诺所著《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的随感，显得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更为系统的《启蒙辩证法》中的论辩更有教益。沃尔特·惠特曼那首以“纯正的女低音在风琴阁楼吟唱”开始的《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其恣意列举的形式对内战前美国环境状态的揭示，远远超过了严整有序的另一首——《我听见美国在歌唱》(*I Hear America Singing*)。但这两种模式也是互补的，即便在它们相互排斥的时候。瑞秋·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1962)能成为对公共政策产生直接和重大影响的寥寥几部环境文学作品之一，而其他几部研究深入的同题材当代作品却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她也能写出《惊奇感》(*A Sense of Wonder*)那样的书。不过，如果卡逊关心的仅仅是颂扬自然之美，她的声音恐怕也早已湮没于时间长河了。

我也试图写出一本警示性和探索性的书。因为本书要考察的是一种扩展迅速的研究局面，所以只能作一种暂时性说明——我希望它明晰有力，但又特意使其呈现出探讨性而非“决断性”的风貌。文学生态话语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践行，其合作更具全球性，跨学科性更强，其形式也因此变得更加多元——面对这种状况，参与者必须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当站在运动内部或周围的某一位置进行言说，而不是像一位卢梭式立法者那样“代表”这个运动去言说。本书的读者会很快意识到作者是这样一个人：其职业的特定基础是两百年的美国文学和文化史，同时，他在竭尽全力扩展其并非全知全能的视野。

---

[1]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ed. Hyder Edward Roll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 224.



那些已经比较熟悉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环境倾向的人士可能会觉得“环境批评”是策略性的歧义用法。书中还将在术语层面对此进一步解释。我特意避免在书名中使用“生态批评”，尽管文学—环境研究是通过这个概括性术语才广为人知的；尽管我自己在本书的许多语境中也多次使用该词；尽管我期望本书获得注意和评论时，该词被用作基本的查询词。在此我想简要说明理由：首先，“生态批评”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仍是一个卡通形象——知识肤浅的自然崇拜者俱乐部。这个形象树立于这项运动的青涩时期，即使曾经属实，今天也已不再适用。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我相信，“环境”这个前缀胜过“生态”，因为它更能概括研究对象的混杂性——一切“环境”实际上都融合了“自然的”与“建构的”元素；“环境”也更好地囊括了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关注焦点，其种类不断增长，对大都市和/或受污染的景观，还有环境平等问题的研究尤其越来越多——它们突破了早期生态批评对自然文学和着重提倡自然保护的环境主义文学的集中关注。第三，“环境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更准确地体现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中的跨学科组合——其研究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近年来，它与文化研究的合作多于与科学学科的合作。

本书包括四大部分，分别讨论当代环境批评的出现（第一章）及环境批评中最具特色的三个关注点——对环境想象和再现问题的探索（第二章）、对于作为艺术和生活经验中一个基本维度的地方（place）的接受兴趣（第三章）、强烈的伦理和/或政治责任感（第四章）。在上述各个领域进行的环境批评都不是一言堂。每个舞台都争论不休，研究重心也在不断转移。简而言之，环境批评是一个动态的工程，而且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保持着这种动态。

## 致 谢

在本书完成前的多年之中，许多人的智慧和榜样给予我启迪，他们的姓名我已无法一一道出。因此，我的致谢只能局限于四个方面的人士。感谢葡萄牙英美研究协会，北京大学英语系，犹他大学塔纳(Tanner)中心，由罗杰·兰丁(Roger Lundin)指导、里利基金会资助的宗教与美国文化专题研讨会，国家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以及北卡莱罗纳大学英语系等，他们使我有机会提炼书中的部分观点。深深地感谢我现在和过去那些关注环境倾向的人文研究的学生：岚·布依(Lan Bui)、吕蓓卡·古尔德(Rebecca Gould)、司各特·海斯(Scott Hess)、史蒂夫·赫尔姆斯(Steve Holmes)、斯蒂凡妮·勒芒那吉(Stephanie LeMenager)、纳撒尼尔·路易斯(Nathaniel Lewis)、苏莱曼·奥斯曼(Suleiman Osman)、托维斯·佩吉(Tovis Page)、威廉·佩纳帕克(William Pannacker)、朱迪丝·理查森(Judith Richardson)和迈克·兹伊瑟(Michael Ziser)，感谢他们的知识活力和(他们未必意识到的)反对意见。感谢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约翰·艾尔德(John Elder)、理查德·佛曼(Richard Forman)、威恩·弗兰克林(Wayne Franklin)、乔治·汉德利(George Handley)、埃里克·西格斯(Eric Higgs)、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路易斯·韦斯特灵(Louis Westling)，他们就许多具体问题提出了深思熟虑而富有价值的建议。最后要说的是，我无法想象，没有艾玛·比弗斯(Emma Beaves)、加德·希克曼(Jared Hickman)和格莱臣·哈尔茨(Gretchen Hulst)等的研究协助，这本书如何得以完成。当然，书中一切不足均由我个人负责。

# 目 录

译者序	3
序 言	7
致 谢	10
第一章 环境批评初露头角	1
第二章 世界、文本与生态批评家	33
第三章 空间、地方与想象：从本地到全球	69
第四章 环境批评的伦理与政治	107
第五章 环境批评的未来	141
术语表	147
参考文献	165

# 第一章

## 环境批评初露头角

只有到了 20 世纪末，我们才有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关注环境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开始成为一种自觉运动，只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但它的发展是迅速的。可以提供证明的一个迹象是：过去十年里，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 (ASLE) 已由美国北方一个区域的骚动 (ferment) 发展成为拥有上千名成员的组织，其分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延伸——从英国，到日本、韩国，再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个在我初入环境批评领域时困扰我的问题——“有谁听我说话？”已经让位于“我怎么才能跟得上这项新事业的前进脚步？”

迅速成长未必是成熟或成功。“生态批评” (ecocriticism) 这个最为常见的、对一个成分日渐复杂的运动进行总括的术语，还没有赢得和性别批评或后殖民批评或种族批评等研究同等的身份。我相信，最终它可以赢得，但是目前它仍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条路上障碍重重，既有外设的，也有自置的。

乍看上去，文学批评研究中的这种环境转向，近年来才蹒跚而至，似乎令人奇怪。因为无论是艺术家的创作还是批评家的反思中，对于物质世界如何受到理论、想象和技术的介入、吸收与重塑的问题，一直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人类最早的故事，都是关于地球的创造、关于神或者人类机巧的“第二自然”对地球造成的变化，即如西塞罗 (Cicero)

最早所称——以不同方式构造环境伦理的传说。至少在一个事例中，这些故事可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创世纪》——希伯来人和基督教首经文的开篇诸章，被归罪为西方技术主宰主义（*technodominationism*）的根源，书中说：上帝授权人类去“统治”海洋和大地的生物，使其“臣服”。也有人反驳说，这种论点既误读了历史也误读了圣经文本：“教养”（*cultivate*）是书中一个更为关键的词语，其暗含之意是虔诚的管理，而非改造。<sup>[1]</sup>我之所以提到这种争论，目的不是要做仲裁，而只是想使大家注意环境话语的古老性和持久性。同时，无论是在单个思想传统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比较来看，它也都是多变的。比如，上述两种对犹太—基督教思想的阅读可以与玛雅人神话相对照，玛雅艺术作品中再现的神，在几次失败后终于用玉米塑造出人类，而这玉米是在先出世的动物帮助下收获的。因此，这象征着“那种肯定存在于人类、植物和动物之中的集体幸存”。而在毛利人的宇宙学中，创造则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人性和自然世界的一切事物总是

[1] 这里概括了几乎长达四十年的争论，其开端是林恩·怀特所著《我们的生态危机之历史根源》（White, 1967），文中坚信技术主宰主义的责任者是犹太基督教。怀特的论点遭到圣经研究者、神学家和环境伦理学家的异议，他们令人信服地揭露了论点中的偏见性，但并没有永久性地结束这种指控。很多这方面的回应可见以下出版物中：Timothy Weiskel,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Lynn White Controversy” (<http://ecoethics.net/bib/1997/enca-001.htm>)。由于《创世纪》第1-2章有着不同的抄写者，他们分属“祭司派”和“耶和华派”（*priestly and Jahwistly*）关于创造有着不同的记载，所以对这场争论做出判决是件复杂的事情。前者比后者更具支配主义意味。[祭司派，指基督教徒以耶稣的生活和教诲为榜样，坚信耶稣是教世主或追随宗教的人。“耶和华派”意指最早的《旧约全书》首六卷的作者，称上帝为耶和华（Yahweh）。——译注]在此我特别追随了克里斯蒂安·希尔伯特的分析，见 Christian Hiebert, “The Human Vocation,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Christian Traditions”,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ed. Dieter T. Hessel and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5–154, 此书是希尔伯特另一本书的简要继续，见 Hiebert, *The Yahwist's Landscape: Nature and Religion in Early Isra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在不断涌现；总是在不断展示。”<sup>[1]</sup>

上述一切都表明，如果我们说今天的环境批评仍然算是一个正在破土而出的新兴话语，那么它的根基却十分古老。对文学学者和知识史学者们来说，自其研究领域产生以来，“自然观念”的种种形式一直是一个主要的或者至少是最后残存的关注对象。<sup>[2]</sup>既然它被看做遗产，那么就引发了问题：当前的运动与过去的实践相比，其突破程度有多么显著。一个在百余年中都特别安定且声誉良好的研究领域中，有什么东西可以算作真正新鲜的、不同的、远不那么“激进”的？了解浪漫主义诗歌批评思想转变史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生态批评无视当时流行的后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方法，坚决主张华兹华斯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自然诗人，其观点颇像一个重新流行的老款式——新维多利亚式戒指那样令人怀疑。尽管其论述中有着重新打造的内容——强调诗人不仅有着对自然的热爱，而且是前生态学知识和环境责任感。这是一个自生态批评呱呱坠地之时就烦扰着她的幽灵：怀疑她说到底就是那些老式的狂热，无非是穿了件新外衣。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作为一个问题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致的关注，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关于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如何进行这项

[1] Victor D. Montejo, "The Road to Heaven: Jakalte Maya Beliefs, Religion, and the Ecology," in *Indigenous Traditions and Ecology: The Interbeing of Cosmology and Community*, ed. John A. Gri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77; Manuka Henare, "Tapu, Mana, Mauri, Hau, Wairua: A Māori Philosophy of Vitalism and Cosmos," in the same volume, 198. 蒙特约 (Montejo) 关于玛雅人的参考资料为 Popul Vuh, Book III, Chapter 1-a post-conquest transcription.

[2] 在此，我借用了雷蒙·威廉姆斯对文化所做的有用的区分，他区分了残留的、主导的和刚刚出现的文化 (Williams, 1977: 121-127)。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用，因为在“刚刚出现的”和“主导的”或者“真正刚刚浮现的文化实践的复制本” (126页) 之间进行辨析十分困难，而威廉姆斯没有把这种困难最小化。正如我们能够看到的，尤其在本书第四章能够看到，区分环境批评中什么是、什么不是真正激进的，并非易事。

研究的争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肯定还会继续下去。这证明，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纠正环境问题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可见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导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绝大多数批评理论的版本中——即使当时“环境”正在引发日益增强的公众关注，而且在科学、经济、法律 and 公共政策研究以及历史和伦理学等某些人文领域中，它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乔纳森·贝特 (Jonathan Bate) 研究华兹华斯的一本书是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他在书中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中带着（可以原谅的）激动和反叛：“乔弗里·哈特曼 (Geoffrey Hartman) 抛掉自然，好把我们带入透明的想象；吉罗姆·麦克甘 (Jerome McGann) 抛掉透明的想象，好把我们带入历史和社会”；在他们之后，艾伦·刘又从范畴上地否定了华兹华斯作品中还有自然这么一个东西，除非“由政治性界定行动制定出来” (Bate, 1991: 8, 18)。那些论点有着精彩的表述方式，然而其中的失衡还是值得纠正的。此后生态批评家们的修正性研究证明，同过去从现象学到新历史主义的诸次批评革命中一样，英国浪漫主义确实是一块肥沃多产的土壤 (eg., Kroeber, 1994; McKusick, 2000; Morton, 1994, 2000; Oerlemans, 2002; Fletcher, 2004; Hess, 2004)。

贝特所反对的那种失衡，实际上出现在 20 世纪末期从哈特曼那代人开始的批评理论革命之前。我自己所受的文学教育就可以做一个佐证。当我还在美国东北部求学的时候，我就接受了一种通行的、经过稀释的亚里斯多德诗学理论：把“背景” (setting) 而不是语言本身定义为文学的四大基石之一（另外三个是“情节”、“人物”和“主题”）。但是对这个术语的界定却含糊不清，而且在阅读实践中要求的，无非是用几个例行公事的句子草草交代被讨论的作品中的地点而已。只有在一些少见的个案中，比如托马斯·哈代的《归乡》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中，我们才会倾向于这样认识：像艾格登·希斯 (Egdon Heath) 这样的一个非人类实体，也可以成为一部作品的主要“人物”或者行动力量。除此之外，“背景”真正担当的作用，不过是人类戏剧的一个

衬托,即使在华兹华斯的《汀登寺》或者梭罗的《瓦尔登湖》中也不例外。尽管我首次阅读这些作品的时间和瑞秋·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纽约人》(*The New Yorker*)上连载发表的时间差不多,而且先父当时正以我们当地规划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进行着卡逊式的战斗。恐怕这些都没能对我的早期文学训练有任何影响,即使我的导师们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其中一位给我们布置的作业是卡逊此前的畅销书《环抱我们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 1950)。不过,它只是被看做掌握描述性语言艺术的一个范例,那种关于试穿新衣或者在镜子前摆姿势的描写也可以和它派同样的用途。

影响过我的上述心态在美国作家欧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一次矜持的道歉中有所体现。她就“小说中的地方”(Place in Fiction)写过一篇富有启示的论文,在文章开头,她对地方表示歉意。她将这种地方看做“守护小说迅捷之手的小天使之一”,和它作比较的是“人物、情节、象征意义”,尤其是“感情,在我眼中,它佩着王冠翱翔在至高处,把地方恰当地贬至阴影之中”(Welty, 1970: 125)。

比起韦尔蒂生活的20世纪40年代,为什么各种关于环境的话语今天看起来更加重要?最为显见的答案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来年中,“环境”变成了头版新闻。与核竞赛相比,非预谋的环境灾难可能引发的末世景象显得更具威胁。对“环境”状况和命运的公共关注不断扩大影响面,从西方发展到全球。在我写作的此刻,肯尼亚的环境激进主义者万加利·马泰(Wangari Maathai)被授予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关于环境关注发展程度的最新信号。自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环境关注曾被“反恐战争”抢了些风头,却绝对没有淡出。这种发展之下,潜藏着一种日益加剧的不安,原因是现代工业社会无力应付其无意间造成的环境后果。当代社会理论学界的瑞秋·卡逊——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把它称作“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尤其指这样一种担心:即使是这个世界上的特权阶级也栖身于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其危险程度无法预料、计算和控



制，也很难逃避（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 6; cf. Beck, 1986; Williams, 2004）。

进而论之，环境问题越来越强地刺激着艺术创作者和学术研究者。在高等院校内部，跨学科的环境研究项目也在增多，因为学生们对此要求之强烈不亚于研究计划的制订者。尽管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迄今为止还是这类项目的主要担当者，但相当数量的人文学者也已投入其中，很多人将原本作为公民就拥有的责任感投入到与环境方向的教学和研究中去。实际上，很多非人文学者会同意、也经常比持怀疑倾向的人文学者更乐于同意：洞察力、价值观、文化和想象等问题，是解决今天环境危机的关键所在，它们至少和科学研究、技术手段和法律规定有着同等的基本作用。如果参与环境对话的我们感到自己在学院内外都只是在装点门面，那可能更多是因为在我们的内部，关于作用、方法和声音有着很多争论和不确定，而不是因为学术圈内外在人文学科的“非实用性”之上附加的那种污名。

## 世纪末的骚动：一个快照

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参与环境转向的文学学者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一个开启心智而又成分复杂的跨学科交流队伍——其中有生命科学家、气象学家、公共政策专家、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景观建筑学家、环境律师，甚至应用数学家和环境工程师。学者之间的交流开始消除或者继续澄清其本行学科工作令人迷惑之处。这种骚动状态引发了相反的两种反应，它们表面上比实质上更加对立：一个是对现行批评理论模式的抵制，另一个则是对理论的探究。

很多早期生态批评家把这个运动主要看成是“拯救”文学的一个途径——它可使文学摆脱由批评理论的结构主义革命造成的读者远离文本、文本远离世界的状况。这些站在生态批评立场上的“政见不同者”寻求的，是在（关于环境的）创作和批评著作与关于环境（特别是自然